

21世纪中国民俗文化研究走向

韩养民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21世纪是中国民俗文化进入理性思维的时代,它要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宏观,为民俗文化定位,阐释它与政治、宗教、礼法、道德、艺术等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促进社会风俗的现代化,重构中国民俗学文化大厦。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文化;21世纪;理性思维;精华;糟粕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0)01-0099-04

中国民俗文化的长河流入21世纪,将闪现出一道与20世纪颇为不同的文化风景线:民俗文化研究进入理性思维时代,它将高扬起多元化、现代化学说,重新建构中国民俗学文化的大厦,使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学科。

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学者们跳出前人藩篱,从各个角度对中国民俗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近百年的努力,使民俗学的研究有了新突破,这不仅体现在以传统的研究方法,把民俗文化从正史、野史到文人笔记小说的历史堆积中梳理了出来,取得了超越曩昔的成果,而且还表现在引入了现代研究方法,对民俗学的理论作了较为有益的探索,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民俗文化结束单纯材料积累迈入科学研究的重要时期。

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时,当我们回首20世纪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之际,稍加审视就会发现:20世纪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具体风俗内容的描述,而对民俗文化重大理论的探讨,还不能尽如人意,因此,学者们为其基础理论的不足而困扰。面向21世纪,我们应当调整视角,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宏观和对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培植与发展,不断开拓研究新视野。当然,突出宏观性研究,并不排斥对微观的探索,而是要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提高民俗文化研究的理论水平。

宏观性研究,首先要为民俗文化定位,明确民俗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阐释民俗文化与政治、宗教、礼法、道德、艺术间的血缘关系,形成系统研究的模式。

众所周知,民俗文化从远古走来,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的永恒伴侣,只要有人类群体,就会有社会群体的生活风尚。在原始社会早期,当智力朦胧未开的先民

收稿日期:1999-10-12

作者简介:韩养民(1939-),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教授。

脑海里尚不知政治、原始宗教、礼法、道德、文字为何物时,民俗文化已是当时社会机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成为先民依靠无形的自然约束力维护社会秩序,整合人们的社会行为,调节人际关系内部自我控制。当此之时,政治、原始宗教、礼法、道德、艺术……被包裹在民俗文化之中成为一个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民俗文化与政治、原始宗教、礼法、道德……难分彼此,以致要在先民日常生活中区分什么是民俗文化,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原始宗教,什么是礼法,什么是道德,就如同抽刀断水一样困难。

风俗与政治、原始宗教、礼法、道德……混沌为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低下的童贞时代的文化现象。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种族的繁衍,民俗文化与政治、原始宗教、礼法、道德、语言、艺术分野。我们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是民俗文化,政治、礼法、原始宗教、道德、艺术、语言……都是在民俗文化的母腹中孕育、诞生的。因此,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石,是人类文化之母。民俗文化如何孕育了政治、礼法、原始宗教、道德、艺术、语言,这将是 21 世纪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

21 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元并存,共处竞争的时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正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异域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论学说、新的娱乐方式、新的社会风尚如同雨后破土的春笋,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扩散到城乡的大街小巷、山间田埂,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

在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面前,我们不能坐在书斋里查经阅典,寻找灵感,应有超前意识,适应社会需要,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对接,与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在风俗现代化制高点上结集起来,针对文化碰撞、风俗冲突中出现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作出明智、富有远见的选择,探寻出一条中国民俗文化现代化之路。尽管这些学者们不会成为拯救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的济世良方,但至少在消除物欲之弊、重塑人生价值观、呼唤风俗现代化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可以预测,从世纪之交乃至 21 世纪中叶,实现风俗现代化仍是学者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它将构成中国民俗文化运动的主线,这既是今日我们对前人事业的继承,也将是后人对今人事业的后续和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期望中华民族风俗现代化,时至今日,依然是学者未圆之梦。我们不能指望有圣人贤哲为我们准备了如何选择今日现代化的“百科全书”,尽管历代哲人的名言遗训不无启迪作用;也不能乞求在异国它邦找到解决现代化的现成模式。民俗文化的选择是群体选择,选择的主体是社会群体。我们必须和人民群众一起选择适合我们国情的民俗文化模式。

21 世纪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我们对民俗文化的选择有三个向度:(1)继续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反思和选择,继承精华,剔除糟粕,克服消极因素;(2)吸纳外来民俗文化;(3)重构新的民俗文化体系;这三个向度的民俗文化选择相互交织在一起,是促进中国民俗文化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当然,中国民俗文化的现代化、多元化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我们将和许多为我们民族世代所崇奉的、曾使我们为之感到骄傲的、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生活方式中的习惯风尚道别,去顺应那些我们所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昔日曾嗤之以鼻的风尚。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继承和批判传统风尚,是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之一。每每论及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脱口而出:继承精华,剔除糟粕。可是精华与糟粕并不在任何时期,任何领域里都是泾渭分明。众所周知,每一种风俗都是人类群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增强群体自己的生活能力而创造出来的行为标准。在此时此地是糟粕,在彼时彼地可能却是精华;对一些人糟粕,对另一些人则是精华。因此,风俗具有两重性,积极与消极并存,科学与迷信连体,不能轻易肯定,简单否定。而我们所谓的“精华”与“糟粕”只能是书生坐在书斋里,站在自己的立场,或站在所谓“历史进步”的高度,以一个裁判官的姿态,对传统风俗、生活方式做出居高临下的判决。然而这种判决纯粹是一种主观臆造,是一种只能在其理想的法庭中生效的判决。

当然,我们在继承优良传统和未来的抉择中,确实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在民俗文化领域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墨守成规的守旧观念依然在人们生活中闪现,许多人总是喜欢深深眷恋历史孕育的那些古老的风俗文化氛围,停留在祖先积习和守成的历史阴影之中,而且一直在干扰着中国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探索之路。这样一来,即使属于“精华”的传统民俗文化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成为人们价值观念落后、思想守旧的根源之一,更何况还有不少落后愚昧和迷信的陈规陋习,成为我们前行的障碍,从而使风俗现代化之路更加曲折,步履更加艰难。如今在市场经济大潮地冲击下,民俗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新世纪怎样继承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精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民族自强精神;怎样剔除封建糟粕,在优秀民俗文化的基础上,重构新时代的风俗文化格局,这是民俗文化学者们必须研究的又一新课题。

三

在理论上经过一定的积累,重建中国民俗文化学理论大厦,是 21 世纪迫在眉睫的任务。

民俗文化学是研究社会群体自发规范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并总结为一定理论方法,用以移风易俗的应用性的新学科,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综合性学科。它不是孤立地借助于某一有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是要与许多学科相伴而行,需要综合地运用有关学科的资料方法,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研究。就其本身而言,它的诞生、发展、变迁无不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经济学、艺术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先天性”的血缘关系,互相补充、彼此影响。这些学科为民俗文化学提供了具有基础意义的理论、方法,民俗文化学只有在吸收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独特性,使其体系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方能完善为独立的新学科。例如,民俗文化学与文学艺术有明显的粘附性,不可忽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把人们的生活方式展示给读者。任何作品一旦缺乏社会风俗的描写,人物形象雷同化,语言说教,毫无生活气息,就会使典型形象黯然失色。而社会风俗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空间上看,无论社会生活,还是行为准则,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一个无限广大的整体;从时间上来看,社会风俗习惯日复一日,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社会风俗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无限性,给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不可穷尽的创作素材。因此,民俗文化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历来作家都十分重视风俗的描写,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著名的作家,都是高明的“风俗画师”。巴尔扎克是世界公认的“时代的风俗画师”。也有人称鲁迅也是“时代的风俗画师”。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鲁迅,都是当之无愧的。你看:鲁迅笔下故乡风土人情描写得是何等丰富多彩:水乡风光、人情世态、方言土语、特产服饰、茶馆酒肆、药店质铺、婚丧礼俗、四时八节、庵堂寺庙、社戏赛会、赌博游戏,可以说鲁迅作品是绍

兴民俗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在鲁迅作品中,倘若离开绍兴毡帽就没有阿Q,离开咸亨酒店就没有孔乙己,离开了绍兴方言土语就没有七斤嫂和爱姑。鲁迅通过对故乡风俗的描写,折射出浙东、江浙以至旧中国风土人情的生动画面,读后令人深思,给人启迪。

民俗文化与其他各学科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学者们关注和思考。21世纪,由于学者对民俗学许多重大课题研究的深入,中国民俗学理论大厦必将矗立起来,构筑起自己的学科体系。我们可以预料新的世纪将从根本上改变民俗文化研究对一些学科的附庸,中国民俗心理学、中国民俗政治学、中国民俗民族学、中国民俗地理学、中国民俗美学、中国民俗比较学……等拓荒之作必将问世,21世纪将是民俗文化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将为最终实现民俗文化多元化、现代化、学科体系理论化、科学化作出无愧于我们民族的贡献。

[责任编辑 黄维民]

《中国通史》CAI教材已出版

由我校文博学院教师陈峰任主编,傅建成、岳琬任副主编的《中国通史》CAI教材,最近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以三张光盘的形式正式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中国通史》CAI教材系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

长期以来,在高校的中国通史教学中一直存在教材内容传统老化,表现形式单一等问题,使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变成了单调枯燥的文字堆积,并增加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可以说,沉重的书本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的负担,更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已无法适应高校教育发展的要求。虽然在长期的教改中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解决办法,但因为思路和方法仍局限于书本教材和课堂讲法之上,所以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和改进。《中国通史》CAI教材的研制,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本教材主要内容和结构如下:

1. 中国通史解说词,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总体和各段历史内容进行概要介绍;
2. 有关中国历史的图片七千数百幅、录像数十分钟以及部分动画,以直观、形象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
3. 中国通史文字教材,约120多万字,并与部分图片、录像连接;
4. 约数百万字的中国通史数据库,主要收录近十余年来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可以通过多种查询途径,以便了解有关研究现状。

《中国通史》CAI教材研制课题组聘请了全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学术顾问,他们是:国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国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漆侠教授,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魏宏运教授等权威学者。各位学术顾问对课题组的工作非常关心,在百忙中对项目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指导,也对课题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本CAI教材存储了有关教学内容的大量历史图像、声像和文字资料,通过投影仪、闭路电视或微机展现在课堂上,可以收到如下效果:其一,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思考能力;其二,减轻教师讲课的劳动强度;其三,有利于改变以教师为教学中心的教育模式,使课堂成为在教师引导下的交互式双边教学活动;最后,还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使人才的培养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通史》CAI教材的出版,将对面向21世纪的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产生积极的作用。

(黄 沙)